

文化遗产及大规模暴行

詹姆斯·库诺 (James Cuno) 与托马斯·G·怀斯 (Thomas G. Weiss) 编辑

序 — 伊琳娜·博科娃 (Irina Bokova)

前言与致谢 — 詹姆斯·库诺 (James Cuno) 与托马斯·G·怀斯 (Thomas G. Weiss)

縮寫列表

简介：文化遗产及大规模暴行 — 詹姆斯·库诺 (James Cuno) 与 托马斯·G·怀斯 (Thomas G. Weiss)

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遭到的残暴破坏引发了全球人民对这一不可否认、但常被忽视的行径的强烈反对。历史证明，对文化遗产的袭击与对人民的袭击几乎难以切割。

摘要: 2020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曾发出威胁，若伊朗为美国针对性刺杀伊朗最高将领之一——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 (Qassim Suleimani) 将军一事而报复，则美国将对伊52处目标中的文化遗产展开袭击。特朗普表示，美国已将这些目标定为“较高级别的、对伊朗及伊朗文化至关重要的”遗址。该声明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一片哗然，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美国官员均指出，华盛顿已签署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1954年公约。从古至今，以文化遗产为目标的袭击不可胜数。近代的例子包括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莫斯塔尔古桥、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马里廷巴克图的多座陵墓以及叙利亚巴尔米拉的古希腊罗马遗址。在该简介中，作者质疑，假设拉菲尔·莱姆金在其起草的1948年《危害种族罪公约》中保留了最初将文化与人类灭绝行径均囊括其中的提议，将会怎样？简介讨论了文化遗产的“价值”、文化遗产常被当做袭击目标的原因、此类袭击行为的人道主义后果以及现有国际法的宗旨。该简介运用了保护的责任 (R2P) 中有关概念与政治的教训。构成本书的前提是，对文化遗产的袭击几乎始终与对目标人群的袭击密不可分，这是以民族与宗教团体为目标的军事行动与暴力行径中的必要手段。这两种袭击均为蓄意行为，彼此之间几乎难以切割。它们均以彻底摧毁目标人群及文化遗产为最终目的。

第一部分文化遗产及其价值

简介 — 詹姆斯·库诺 (James Cuno) 与托马斯·G·怀斯 (Thomas G. Weiss)

1. 我们是谁？身份与文化遗产 — 奎迈·安东尼·阿皮亚 (Kwame Anthony Appiah)

在 *The Lies That Bind*（《束缚我们的谎言》）一书中，作者奎迈·安东尼·阿皮亚论证了“西方”身份的概念成为等级制度、社会地位及权力结构之基础的过程。他写道，西方文化这一概念属于现代建构，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到北大西洋公约”的宏大叙事，掩盖了所有文化实践与客体的复杂性。

摘要：“西方世界”的范围是什么？认同“西方文奔跑化”意味着什么？在 *The Lies That Bind*（《束缚我们的谎言》）一书中，作者奎迈·安东尼·阿皮亚论证了西方身份的观念成为等级制度、社会地位及权力结构之基础的过程。西方文化这一概念属于现代建构，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到北大西洋公约”的宏大叙事弧，其前身是基督教世界与欧洲的各种观念。尽管这部著作主要讨论了对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但阿皮亚提醒我们，所有文化实践及文化物品必须被视为流动的、可变的、无限复杂的，并且最终能够反对任何单一群体的所有权。

2. 我们为何重视文化遗产？— 尼尔·麦格雷戈 (Neil MacGregor)

历史文物若能代表和颂扬一段对社群自我认知至关重要的叙事，那么这样的历史文物就会成为文化遗产：如果这种自我认知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那么历史文物可能需要被摧毁。对于迫切希望重新确立政治或宗教立场的社群（如 1990 年后的东欧或 2000 年后的中东），已被摒弃的、蕴含叙事的具体实物通常被视为复兴的绊脚石，因此必须被清除。一个社群是否有权利将自己眼中对其再生构成威胁的文物摧毁？谁又有权阻止他们？

摘要：

本文认为，文化遗产关乎叙事与物质——通常是身份政治的物质表现。普通人及政治领导者最重视的建筑、纪念碑和雕像并非能够讲述历史，而代表当今自我认知或理想自我的叙事。

企图改变宗教或政治集体叙事的激进分子定会妄想消除其眼中对历史的错误性煽动言论。为实现其理想中更美好的社会，他们将会摧毁文化遗产——西欧或美国的历史雕像、中东的宗教建筑或东欧的政治纪念碑。国际上的反应似乎往往取决于意识形态上的信仰。随着东欧各国逐渐摆脱苏联的统治，这些国家摧毁或摒弃了历史上代表共产主义的纪念碑，建立了代表其新身份的其它标志性实体。在华沙、维尔纽斯及柏林，任何一座被视为重要文化遗产的皇宫无不遭到摧毁，因为它们曾是民族认同的鲜明代表。这三座城市现均得到重建，再次彰显了本国的身份和抱负——而如今，这些经过重建的城市甚至比原有规模更为壮观，甚是令人费解。

3. 遭受摧残的文化遗产——以史为鉴 — 赫尔曼·帕辛格 (Hermann Parzinger)

从古至今，文化遗产时常遭到蓄意摧毁。尽管动机各不相同，但其中往往不乏经济因素，而在古代，政治动机则占据首位。近年来在各个欧洲殖民国家，文化灭绝往往伴随着残酷暴行，在 20 世纪及 21 世纪初尤为常见，袭击的主要目标为人民及其文化身份。

摘要：本章探究了从古至今蓄意摧毁文化遗产行为的历史，并分析了致使文化产品与文化遗产惨遭摧毁的政治、宗教、社会、种族及其它状况与动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与残害平民的战争犯罪、危害人类罪及其它暴行之间的关联。作者引用从古代至拜占庭时期的圣像破坏运动、新教宗教改革、欧洲殖民时期、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以及将系统性消灭文

化与人性发挥到极致的纳粹时期的各种案例，对这样的关联进行了探究。之后，作者着重介绍了柬埔寨红色高棉组织的罪行以及巴尔干战争中的种族与文化清洗运动。最后，作者揭露了伊朗与叙利亚所谓的伊斯兰教国以布教为目的在全球人民的注视下摧毁文化遗产及人民的极恶行径。

4. 古代晚期的文化遗产 — G·W·鲍尔索克 (GW Bowerstock)

古代晚期为遗产摧毁与残酷暴行的研究提供诸多例证。尽管古代不乏此类恐怖行径的夸张事例，包括古科林斯被夷为平地，但之后的历史时期鲜有此类暴行发生。在遗产惨遭大肆毁灭、人口大屠杀之后，此类事件若在一段时期内不再或极少发生，我们必须思考其中的原因。

摘要: 古代晚期为遗产摧毁与残酷暴行的研究提供诸多例证。在古代晚期这一历史时期，不乏此类恐怖行径的夸张事例，包括古科林斯被夷为平地，以及八千名安纳托利亚人在一日内惨遭杀戮。然而在耶路撒冷被摧毁后，除少数狂热事例外（如谋杀希帕蒂娅），罗马帝国很少再次发生此类恐怖事件。我们不得问，是什么导致这一明显变化？此类暴力行为真正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公元三世纪与六世纪的瘟疫减少了毁灭行动与残酷暴行，然而宗教——尤以基督教为主——出现时却导致二者的爆发。

5. 穆斯林世界的文字遗产 — 莎宾娜·施密特克 (Sabine Schmidtke)

伊斯兰教的手稿遗产受到多种形式的威胁——操作不当、偷窃、恶劣的天气状况以及肆意破坏。在过去数十年间，蓄意破坏伊斯兰教手抄本的案例屡见不鲜，而来源不明的伊斯兰教手抄本持续被拍卖，落入私人手中。穆斯林世界文化遗产遭到的灾难性破坏无可估量，其中受到最大冲击的文化形式和机构当属书籍与手稿图书馆。

摘要: 穆斯林世界的文字遗产是文化遗产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伊斯兰教的多数文字遗产至今仍以手稿的形式保存。这种手稿遗产持续遭到多种形式的威胁——操作不当、暴露、偷窃、恶劣的天气状况以及肆意破坏。在过去数十年间，蓄意破坏伊斯兰教手稿的案例屡见不鲜。例如，1992年科索沃及波斯尼亚的多座图书馆与博物馆遭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轰炸，以及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余波中以及自2003年以来伊拉克不断被他国侵略和占领，多数手稿图书馆遭到洗劫和破坏。宗派主义对伊斯兰教的部分文化遗产构成另一种威胁：图书馆若是藏有被视为持有异端观点的手稿，即成为被摧毁的目标，而历史纪念碑亦是如此，它们在过去数十年间不断被穆斯林极端分子以“净化”伊斯兰教为名摧毁。

6. 重视我们的文化遗产传承 — 伊斯梅尔·赛拉格丁 (Ismail Serageldin)

纪念碑、历史街区等有形的、不可移动的遗址拥有重要的固有价值，能够被衡量。我们拥有严谨的方法，帮助我们量化文化遗产的价值，并进一步突出肆意袭击文化遗产行为的恶劣影响，以及世界人民应该对此类行径采取的防范程度。

摘要: 社会及个人无不依附于其文化遗产，这种依附关系有助于确定其身份，并提高自尊。非政府武装团体、民兵组织、专制政府或侵略军的蓄意行为在摧毁有形或无形文化遗产的过程中造成的损失，远远超出其对物质的破坏。此类行径无异于文化及社会大屠杀。尝试量化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有助于了解摧毁行为的巨大代价。我们的技术能够很好地计算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以及有形和无形的价值。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从

而巩固我们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因为只有那些与历史有着紧密的、持续不断的联系的人们才能更好地设想未来。

第二部分遭到围困的文化遗产：近代案例

简介 — 詹姆斯·库诺 (James Cuno) 与托马斯·G·怀斯 (Thomas G. Weiss)

7. 中国“反宗教极端主义”运动下的维吾尔族传统 — 雷切尔·哈里斯 (Rachel Harris)

中国对维吾尔族宗教遗产的大规模破坏，被其作为反恐行动之必要组成部分呈现给外界。相反，它代表了对维吾尔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根本性攻击，是为实现更广泛的经济与地缘政治目标而全面安定新疆的努力的一部分。

摘要: 在过去的几年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变成一个戒备森严的极权地区，约 150 万突厥穆斯林遭到关押，他们受到教条灌输，并被强迫劳动。中国视其行动为应对极端恐怖主义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而国际观察者和政府则将中国的政策视为种族灭绝。然而，中国将对该地区遗产所采取的政策完全归入国家政治与经济目标之中。包括清真寺、墓地和朝圣之地在内的维吾尔宗教遗产遭到拆毁，而这些遗址的基本价值存在于复杂且悠久的历史意义、社群形式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宗教与文化表现形式之中。这种破坏行为代表了对维吾尔族文化与认同的根本性打击，是同化与平定该地区的努力之一部分，以实现“一带一路”的经济与战略目标。

8. 不以和平为目的的重建就是毁灭：冲突后斯里兰卡与阿富汗的遗产“重建” — 卡维塔·辛格 (Kavita Singh)

冲突后的文化重建可能会成为权势者巩固国家政权、加快少数民族边缘化的手段。本文以斯里兰卡贾夫纳与阿富汗巴米扬为例，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

摘要: 斯里兰卡与阿富汗冲突后时期的文化重建工作在宗教或少数民族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形成了令人不安的局面。在斯里兰卡贾夫纳半岛北部生活着全国信奉印度教的多数泰米尔人，而在阿富汗巴米扬山谷则居住着什叶派哈扎拉人。文章结合两地的情况，对这种局面进行探究。这些地区重建与遗址保护本应以修复社会为目的，却成为一方持续统治另一方的工具。斯里兰卡的多数派政府试图利用一切工具“恢复”遗址，实则希望剥夺泰米尔少数民族的权力。而在阿富汗中央政府与长期处在国家生活边缘的少数民族争权夺势的过程中，在塔利班统治结束后前来支援的各个国际组织在无意间挑拨了二者之间微妙的关系。

9. 表演式摧毁：Da'esh（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以及战争对伊拉克遗产的影响 — 吉尔·J·斯坦因 (Gil J. Stein)

2013 至 2019 年间，Da'esh（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多数地区发动了名为“表演式摧毁”的新型暴力袭击——这种精心策划的袭击行径将文化与物质灭绝相结合，同时在全球互联网上进行宣扬。Da'esh 将其针对人民和文化遗产纪念碑的行径粉饰为宗教义务。

摘要: Da'esh（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崛起与扩张的特点是通过一种“表演式摧毁”的新型危险手段，大肆宣扬其对宗教团体和文化遗产的袭击。对纪念碑和遗址的表演式摧毁

是一种精心编排的、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的、文化灭绝与身体灭绝相结合的公共策略。Da'esh 对人民及物质发起的战争深植于一个综合体系内，将宗教意识形态、政治纲领以及极端暴力行为相结合，并在互联网上进行夸大和强化。政治行动被披上了宗教行为的外衣，这符合 Da'esh 圣战主义者对伊斯兰教信条的理解以及恢复伊斯兰教理想愿望最初、最纯粹的使命。尽管 Da'esh 伊斯兰国的统治地位已被摧毁，但其疯狂的暴力形式则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模式，极易被全球非政府武装团体所效仿。

10. 阿勒波的毁灭：叙利亚战争对世界遗产城市的影响 — 弗朗切斯科·班德林 (Francesco Bandarin)

阿勒波在 2012-2016 年叙利亚战争期间遭受了大规模破坏，当时这座城市是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之间主要冲突的中心。本章记述了军事活动的演变，并分析了冲突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以及国际遗产保护体系存在的局限。

摘要: 叙利亚的各大城市与遗址在 2011-2020 年的十年战争期间惨遭毁灭性袭击。阿勒波的状况最为惨烈，在 2012-2016 年的冲突中几乎被完全摧毁。那里人口锐减至仅剩两百万人，伤亡人数超过 25,000 人。该城所有地区及其主要纪念碑、露天市场和清真寺均受到严重的损毁。房屋同样受到较大程度的破坏，而市民丧失了水电、健康与教育服务。本章探究了冲突的发展过程、其对城市社会与建筑结构的影响、对重要文化遗产的摧毁以及叙利亚国内外行动者在战争中起到的作用。最后，文章分析了国际遗产冲突保护体系的当前状况与存在的缺陷。

11. 霍姆斯遗失的遗产：从纪念碑的摧毁到意义的消失 — 马尔瓦·阿萨伯尼 (Marwa Al-Sabouni)

我所在的这座鲜为人知的城市登上国际新闻头条完全是因为战争。然而，霍姆斯并非一直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在古代，它曾是一座荣耀之都，孕育了一位在罗马执政的皇后。这座城市的衰落是个谜，隐藏在惨遭摧毁的建筑之下。

摘要: 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因此，建筑的损毁也意味着其存在意义的消失。本章阐述了在修复和保护过程中往往被忽视的意义，认为要回答如何保护遗址和建筑遗产这一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考察保护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保护它。这无疑关乎价值，而价值很容易被过度简化（变成单纯的宗教认同问题）或过度复杂化（变成围绕历史意义的争论）。本章试图通过考察在叙利亚战争中遭受大规模袭击的叙利亚第三大城市霍姆斯，力求在理解遗产价值上找到共识。作者通过重新审视这座城市的历史起源与其地理、类型、文化与宗教价值的关系，发现我们在重建与保护濒危遗产的过程中可能在其黯淡的未来中看到希望。

12. 重建工作由谁定？ — 弗雷德里克·德克纳泰尔 (Frederick Deknatel)

截至 2021 年，叙利亚这座满目疮痍的国家在内战仍未停止、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开始了重建工作。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政府试图利用重建工作巩固政权，以胜利的假象掩盖十余年战争带来的创伤。

摘要: 鉴于长期内战导致的千疮百孔的城市、有限的资源以及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狭隘的专制利益，叙利亚的重建工作将如何开展？阿勒波、霍姆斯及大马士革已经开始了象征性的重建工程，这为我们提供了初步的答案。这些工程项目得到了叙利亚当局的大肆宣传以及外国资助者的部分资助，反映出阿萨德政府将国家重建视为鼓吹工具和精英阶层腐败的手段。重建工作很快确定了优先重建和不予重建的对象，反映出阿萨德政府自作主张、“胜者即正义”的排他思想，同时对曾经由敌对势力控制的大片居民区视而不见。政府的重

建计划涉及是否要将叙利亚的文化遗产包括在内，因为阿勒波与霍姆斯的重要清真寺等遗址的仓促重建或修复工程已成为政府鼓吹行动的平台。叙利亚正在进行的重建工作重蹈了邻国黎巴嫩混乱的战后重建的覆辙，并对刚刚摆脱内战和冲突的其它国家的未来重建工作带来了可怕的影响。

13. 遭到袭击的也门手稿文化 — 莎宾娜·施密特克 (Sabine Schmidtke)

也门栽德派的文字传统丰富多样，在伊斯兰教文明中享有崇高地位。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濒临消失。保护与传承也门文化遗产中这一重要部分对于为也门后代带来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至关重要。

摘要: 也门栽德派的文字传统丰富多样，在伊斯兰教文明中享有崇高地位。也门的多座公共和私人图书馆均藏有最为重要、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栽德派手稿。其它地区和国家，尤其是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欧洲与美国收藏的也门手稿同样意义非凡。鉴于栽德派研究领域中学术状况的不堪，如今也门面临着手稿四散、损失惨重的重重挑战。更为糟糕的是，也门的各大手稿图书馆也岌岌可危。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也门当局不断对手稿进行非法交易，国内多座私人图书馆因政治骚乱和战争遭到严重破坏、抢劫、甚至被摧毁；持续的冲突对当地人民及包括多座图书馆在内的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保护与传承也门文化遗产中这一重要部分对于为也门后代带来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至关重要。

14. 濒危的马里文化遗产：廷巴克图圣人陵墓的摧毁 — 拉扎赫·伊伦都·阿索莫 (Lazare Eloundou Assomo)

2012年1月至12月期间，在马里廷巴克图16处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圣人陵墓中有14处遭到当时占领该城的极端组织的彻底摧毁。本章将对从廷巴克图文化遗产的摧毁到重建策略的全过程进行探究。

摘要: 2012年1月至12月期间，马里悠久的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占领该城的极端组织对廷巴克图16处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圣人陵墓中的14处进行了彻底摧毁，三座清真寺遭到严重破坏，4203份手稿被烧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响应马里政府对国际组织停止此类蓄意行为的呼吁，举行了一场旨在提升人们意识的宣传活动，强调这些陵墓对于构成当地社群社会与宗教生活的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采取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解决措施，强烈谴责摧毁马里文化与宗教遗址的行径，并认可了当地社群在解决马里争端中的重要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样在国际刑事法院将对文化遗产的蓄意摧毁行为视为战争犯罪的决议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开创了国际刑事审判的先河。本章将从当地社群的视角出发，对从廷巴克图文化遗产的摧毁到其采取的重建策略的全过程进行探究。此类大规模损毁行径被当地社群视为披着意识形态外皮的暴力，文章还将分析此类暴力背后的缘由，并探究极端组织通过控制人民的意识、将其变成人体武器散布恐怖的策略。本章在最后解释了采取当地社群的观点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重建陵墓的重要作用。

15. 危地马拉当地受到威胁的遗产 — 维克多·蒙特霍 (Victor Montejo)

数个世纪以来，玛雅人历经征服、殖民与危地马拉统治精英采取的新殖民形式的暴力摧残——如在近代武装冲突中体现的那样。国际社会必须对各国施压，敦促其遵守保护文化遗产的现有法律，而当地学者必须接受培训并获得支持，在玛雅遗址考古调查的持续争论中享有话语权。

摘要: 1960-1996 年间的危地马拉内战源于五个多世纪前西班牙的征服和殖民者的“玛雅灭亡”行径，对玛雅人民及其遗址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本章对这一历史悠久的地区进行了概述，并以现存玛雅人的独特视角清晰列举了这一古代遗产持续面临的危险，而对于玛雅人而言，他们文化传统的方方面面几乎始终未得到应有的保护。文章强调了对当地学者提供培训和支持的需求，以保护玛雅文化遗产，确保玛雅人在就考古调查的持续争辩中享有话语权。此外，文章还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对各国施压，敦促其遵守保护文化遗产的现有法律。

第三部分受到威胁的文化遗产及人口

简介 — 詹姆斯·库诺 (James Cuno) 与托马斯·G·怀斯 (Thomas G. Weiss)

16. 文化清洗与残酷暴行 — 西蒙·亚当斯 (Simon Adams)

在全球的冲突地带，各种非政府武装团体和政府持续对文化遗址与少数民族社群进行袭击。正面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称为“文化清洗”之威胁的国际社会，有义务保护弱势群体免受那些试图摧毁他们的人的伤害。

摘要: 在当今全球各地的冲突地带，各种非政府武装团体和政府不断违反国际法，蓄意对文化遗址与少数民族社群进行袭击。这些人民长期遭受由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 (Irina Bokova) 定义的“文化清洗”的袭击，面临潜在战争犯罪、危害人类罪以及种族灭绝带来的威胁。本章着重分析以下三个事例：2001 年巴米扬大佛的摧毁以及阿富汗哈扎拉族人民遭受的袭击、2014-2017 年伊拉克伊斯兰国与黎凡特对伊拉克北部少数民族文化的摧毁，以及中国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文化的持续破坏。国际社会为应对人类文化遗产遭到的蓄意破坏，有义务保护易受影响的人民免受袭击。

17. 战争中人命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抉择 — 雨果·斯利姆 (Hugo Slim)

尽管文化遗产的本体价值与人类密不可分，但在战争中应优先保证平民与友军战士的生命。因为人类的生命永远有潜力推动文化的新生。

摘要: 本章讨论了在拯救人命还是文化遗产之间做出艰难抉择时涉及到的道德价值观。文章首先分析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以及这种艰难抉择形成的原因，并从依赖关系、身份认同以及普遍性的角度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即文化遗产不仅是人类繁荣的方式，更拥有作为人类的真正本体价值。然后，作者从文化遗产的本体方面提出平民与军队应优先考虑人命还是遗产的问题，论述在危难关头，人命应始终超越文化遗产，因为人类的生命永远有可能推动文化的重生。但应考虑以下三个前提，以减少文化损失：第一，重新计算友军与直接威胁文化遗产的敌军之间的力量比例；第二，满足个人与文化遗产共存亡的愿望，即便留下来意味着死亡；第三，在优先挽救人命的同时努力尝试挽救残存的人类遗产。

18. 拯救石头与拯救生命：从人道主义视角看战争中的文化遗产保护 — 保罗·H·怀斯 (Paul H. Wise)

在实践中，摧毁文化遗产与摧毁人民之间的关系远比传统看法复杂，且需要更加深入的跨学科研究。

摘要: 本章讨论了战争中摧毁文化遗产与摧毁人民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一联系有助于证明遗产保护的合理性，但本文对支持这一联系的证据基础进行了分析。作者发现了五个实践机

制：序幕，这时遗产摧毁预示着后续对目标人群的袭击；挑衅，即袭击遗产以煽动或强化暴力冲突；并行，即摧毁遗产与针对人民的袭击同时发生；延伸；即延长冲突的时间，以持续对遗产进行非法贩运；以及鼓吹，即利用对遗产的损毁故意破坏同样用于保护人民的国际惯例。就普遍性、对人民带来直接暴力危害的影响能力以及对人类健康的间接回弹影响而言，每一个机制都各不相同。毁灭遗产与毁灭人民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且需要更加深入的跨学科研究。

19. 在保护文化遗产中与非政府武装团体交涉 — 詹妮弗·M·威尔士 (Jennifer M. Welsh)

本章探究了非政府武装团体 (nonstate armed group, NSAG) 对文化遗产的威胁与潜在的保护作用。文章明确了这些实体的法律义务，并建议在对非政府武装团体的目标、结构与团体纽带有了清晰的了解并获得与其成员交涉的更大意愿之后，制定有助于限制其行为的策略。

摘要：在当代暴力冲突局势下，非政府武装团体 (NSAG) 应被视为任何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的重中之重。本章首先根据此类团体的目标、结构及行为对其进行分类，然后表示，尽管部分团体对文化遗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其它团体证明了它们对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文章还强调，非政府武装团体并非在法律真空中运行，而是受到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一系列义务的积极约束，团体内的成员均受制于国际刑法。然而，保护文化遗产的主要挑战并非在于制定新规范 NSAG 的行为，而更多地在于确保遵守现有义务。因此，本章继续参考关于好战行为的近代政治科学文献以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约束之根源”计划，提出了 NSAG 行为可以被指导或改变的可能的的方式，以提高其对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与规范的尊重。这些努力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 NSAG 的内部运作方式，以便查明权力来源、信仰及影响，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多数此类团体驻扎的当地社群的了解。然而文章在最后得出以下结论，与 NSAG 进行交涉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反恐主义政策的效应约束了人们与此类团体进行沟通的能力与意愿，以及各国及各个政府组织长期不愿采取措施或做出承诺，使 NSAG 合法化。

20. 尘埃落定后：文化破坏的余波后过渡时期的司法与认同 — 菲利普·桑兹 (Philippe Sands) 与艾丝卢达·莱 (Ashrutha Rai)

在经历残酷暴行后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中，国际法能够采取各种措施应对人们关于文化认同与所有权的质疑。尽管这些措施无法各自单独满足所有受影响的文化权利，但它们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文化遗产与认同之间的纽带。

摘要：文化遗产究竟归属于谁？所属权从个人到团体再到所有人类的传承引发了人们对文化认同以及保护与宣传此类文化遗产责任的基本质疑，同时涉及一系列相关的权利。从超地方性和区域性到国家性和国际性，同心和重叠 (有时冲突) 的利益圈维持着一系列同时发出的归属主张。本章从公共国际法视角出发，追溯了暴行之后出现的对文化遗产的不同所有权主张。尽管国际文化遗产法强调要脱离环境保护文化遗址与财产，但过渡时期的司法概念常常回避棘手的所有权问题，而倾向于为有关社群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每个方法都能够优先考虑或取消某些利益相关方的所有权。从这些将复杂的文化认同概念与大规模暴行造成的破坏相协调的各种努力中，出现了关于文化遗产与认同之间持久的、多层次的、复杂的联系的更广泛的叙述。

第四部分文化遗产与国际法

21. 文化遗产的保护：人与地区之间的纽带 — 帕蒂·格斯坦布利思 (Patty Gerstenblith)

本章探究了在武装冲突中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所遭受的损毁以及新制定的保护责任范围可能的适用性。不可移动的有形遗产与当地社群息息相关，我们应该让这些社群与非政府行动者们参与到传承和保护这些遗产所做的努力当中，这样比主要关注国家与政府组织间利益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可能更有成效。

摘要: 本章从人权视角审视了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所遭受的损毁，并主张文化遗产的意义须从国际、国家与当地社群的角度进行评价。文章简要总结了可适用的国际法律工具与在残酷暴行罪的范围内对文化遗产损毁行为的分类：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以及战争罪。然后，文章转而探讨保护的责任 (R2P) 的全新范围，并重点分析了保护责任中第三大支柱，即保护不可移动的遗产的可能适用性。作者从合理性与可行性的方面评价了四个要素，即军事干预、刑事责任、非政府行动者的参与度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本章得出以下结论，我们应该让当地社群与非政府行动者们参与到传承和保护这些遗产所做的努力当中，这样比主要关注国家与政府组织间利益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可能更有成效。

22. 国际人道主义法与文化财产的保护 — 本杰明·沙尔利耶尔 (Benjamin Charlier) 与图拉尔·穆斯塔法耶夫 (Tural Mustafayev)

完善的国际法律体制的制定能够在武装冲突中保护有形的文化财产。而现在我们该将重点从对法律审查的争辩转到法律的实施上来。

摘要: 有形的文化财产已成为近代武装冲突蓄谋已久的袭击对象，极易受到连带损失，因此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开始关注国际人道主义法对文化财产保护的规定。基于这样的争辩，本章作者认为，国际条约及惯例中均包含全面的法律体制，对文化财产的保护做出了约束。现有法律不仅约束了与文化财产相关的破坏行为以及国家为充分保护文化财产所必须实施的和平时期措施，还制定了标准与制度机制，以支持法律的实施。因此，为使法律起到保护性作用并加强合规性，必然需要关注于支持这些机制的方式。换言之，如果我们不加强这些机制的实施，那么在武装冲突中保护文化财产的国际法律体制便无法生效。

23. 国际人权法与文化遗产 — 马克-安德烈·雷诺 (Marc-André Renold) 与亚历山德罗·切奇 (Alessandro Chechi)

武装冲突的受害者不只有人类。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文物亦容易受到损毁，而当交战团体极力毁灭敌方的身份认同，并因此威胁其（文化）生存时尤为如此。本章通过审视国际人权法与国际文化遗产法之间的相互联系，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

摘要: 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的文物的有形性与人类的无形性密不可分，这种关系源自此类文物所蕴含的象征、精神或历史价值。此类价值源于文物的创造者和那些认同该文物的人。这解释了在武装冲突中残酷暴行为何往往伴随着对敌方有形文化遗产的摧毁与抢劫：交战团体以文化遗产为目标，毁灭敌方的身份认同，甚至将其消灭殆尽。本章通过审视国际人权法对推动国际文化遗产法发展所做的贡献，并谈论文化遗产逐渐与人权条约紧密相连的过程，探究了二者之间的联系。

24. 文化财产的惯例、通则与蓄意破坏 — 弗朗西斯科·弗兰西奥尼 (Francesco Francioni)

尽管出现了某些关于禁止蓄意损毁和抢劫文化遗产的惯例，但这些惯例仅适用于武装冲突与恐怖主义的背景下。但众多法律通则能够对和平时期直接和间接防御蓄意损毁行为做出规定。

摘要: 本章探究了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国际司法机关与国内法庭的惯例，以证明约束国家的部分法律义务是否以国际惯例法和法律通则的形式存在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作者总结，尽管出现了某些关于禁止蓄意损毁和抢劫文化遗产的惯例，但这些惯例仅适用于国际与非国际武装冲突与恐怖主义的背景下。当今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惯例法规适用于和平时期的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法对和平时期摧毁文化遗产行为的漠视，在国际法院规约第 38.1.c 条中有多条法律通则对直接和间接防御蓄意损毁行为和残酷暴行做出了规定。

25. 对摧毁遗产行径的公诉 — 约瑟夫·鲍德利 (Joseph Powderly)

本章记述了国际刑法起诉文化遗产摧毁行径的历史，并展望了此类袭击行为问责制可能的未来发展之路。

摘要: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无论是否以武装冲突为背景，国际刑法司法机制在追究蓄意破坏文化遗产的个人刑事责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本章探究了国际刑法为追究蓄意损毁文化遗产责任的演变过程。文章首先概述了将损毁遗产应承担的个人刑事责任视为国际犯罪的背景，审视了在一战与二战后往往被忽视的努力。作者认真思考了在纽伦堡以及之后在国际刑事法庭上前南斯拉夫的几个关键法律里程碑。最后，作者对国际刑事法庭建立以前的当代发展历程以及未来文化遗产摧毁行径问责制的未来发展轨迹进行了反思。

26. 对抗针对世界遗产与全球文化遗产管理的恐怖袭击 — 莎宾娜·冯·朔尔勒默 (Sabine von Schorlemer)

全球文化遗产管理能够为全球对抗针对文化遗产的恐怖袭击所做的努力提供支持，从而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并推动法律制度的建立。

摘要: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文化遗产日益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鉴于对纪念碑和考古遗址的肆意和蓄意摧毁，以及全新形式的恐怖袭击，本章将探讨为对抗此类袭击所进行的全球文化遗产管理。随着人们越来越相信改进后的全球治理可以在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当地社群、民众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可以成为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普遍保护的关键因素。文章证明了国际社会所做的努力事实上正在从以国家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转变。

第五部分 文化遗产与军事视角

简介 — 詹姆斯·库诺 (James Cuno) 与托马斯·G·怀斯 (Thomas G. Weiss)

27. 保护战争中的文化遗产：难以应对的宗教问题 — 罗恩·E·哈斯纳 (Ron E. Hassner)

当宗教遗址对大量国际信徒和涉及“心灵和思想”组成部分的战争具有重要意义时，战斗人员极有可能保护这些遗址。而这一制约因素很有可能被敌方利用。

摘要: 宗教圣地在探究保护文物这个更加宽泛的问题中非常棘手。本章对二战期间美国就保护欧洲基督教遗址所做的决策进行了探究。即使在这个决定性的残酷斗争中，军事策划者们仍不遗余力地寻找、保护或修复具有文化价值的建筑。作者分析了美国对于保护欧洲文化纪念碑和宗教建筑所做的广泛努力以及盟军所做出的炸毁意大利蒙特卡西诺教堂的艰难决定。我得出的结论是，当宗教遗址对大量国际信徒有着重要意义时，参战者极有可能保护这些遗址，而在涉及“心灵和思想”组成部分的战争中尤为如此。相反，如果敌方利用了这一制约因素，并将圣地作为军事行动的中心，则宗教圣地很有可能遭到摧毁。

28. 从京都到巴格达和德黑兰：文化遗产的领导地位、法律与保护 — 斯科特·D·萨根 (Scott D. Sagan)

武装冲突法如何保护文化遗产？1945年、1991年、2003年及2020年美国军事策划与军事行动的历史表明了战略、道德与法律的逻辑之间复杂的联系。法律规定了义务和限制，并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约束着决策者。

摘要: 武装冲突法如何保护文化遗产？总统哈里·杜鲁门使京都从1945年原子弹袭击中幸免的决策、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目标决策、2003年位于巴格达的伊拉克博物馆遭到的洗劫以及2020年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袭击伊朗文化遗址的威胁都证明了战略逻辑与道德或法律逻辑之间复杂的关系。人们必须始终遵守相称性及预防措施的国际法律原则，以便士兵们勇于冒险并在摧毁文化遗产的危害以及正当摧毁某个目标之间做出准确的衡量。不幸的是，这一复杂的权衡过程往往在敌军藏身于文化遗址附近或其内时变得更加困难。而幸运的是，历史同样揭示了法律约束展现出的积极效力，即便在政治领袖自己并不在乎遵守国际法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对行动决策产生影响。

29. 兵法实践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军事视角 — 鲁思·马格利斯·贝特勒 (Ruth Margolies Beitler) 与 德克斯特·杜根 (Dexter Dugan)

本章探究了在军事行动中保护文化遗产的现代挑战，并评估了美国陆军在这一努力中的当前做法和能力。文章最后探讨了军队为确保优先保护文化遗产可能采取的不同措施。

摘要: 21世纪面临的巨大挑战加剧了军事行动中保护文化遗产的复杂性。社交媒体使用率的增加能够让我们随时观看和传播文化遗产遭到的摧毁，而精准弹药增强了对文化遗址在冲突中幸免遇袭的预测。当遗址并未受到保护或成为连带损失时，这样的预测往往导致我们的仇恨和挫败感的增强。本章探究了在军事行动中保护文化遗产的现代挑战，并通过对美国陆军的正规教义、角色以及最近为在军事行动中保护文化遗产而提高的能力进行研究，评估了美军的当前做法。文章最后探讨了军队为确保其保护行动（或者起码是不伤害行动）得到正确理解而可能采取的不同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加强训练和教育，与主题专家合作，扩大信息作战。

30. 和平行动与文化遗产的保护 — 理查德·高恩 (Richard Gowan)

国际和平卫士们在巴尔干半岛与西非的冲突中保护了文化遗产。尽管和平行动能够为遗址提供保护，但这样的行动应重点解决政治冲突并鼓励当地社群的参与，从而建立需要保护落入敌方手中的文化遗产的共识。

摘要: 长久以来，国际和平卫士们始终在努力应对文化遗产受到的威胁。2017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肯定了和平行动在保护遗址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但人们仍然对这是否是和平卫士真正的优先事项存有疑虑，遗产保护的倡导者们需要证明这样的做法有助于完成其它优先事项，包括保护平民免受暴力袭击、找到冲突后的政治解决方案以及促

进社群层面的和解。尽管军事和平卫士在保护文化遗址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多数和平行动并不足以在其行动范围内始终实现最终目的。和平行动反而应关注遗产保护中的政治与平民问题，强调调解过程中与当地外联行动中的遗产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未能全面跟进其 2017 年的决议，因此应该重新开始支持这项工作。

31. 武装冲突中的文化财产保护：遗产、军队及人道主义部门进行对话与行动的必要性 — 皮特·G·斯通 (Peter G. Stone)

在战争中，我们必须始终优先保护平民。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是保护平民的文化财产，他们的文化财产与历史有着有形和无形的联系，有助于人民身份认同的形成、建立健康、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社群，并带来福祉。

摘要: 本章探讨了五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首先，文章概括了蓝盾组织的职责、使命与抱负，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咨询组织能够在发生武装冲突时为文化财产提供保护 (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CPP)。该组织强调了遗产、人道主义以及军队部门之间合作的必要性。其次，文章简述了文化财产保护尤为悠久的历史，而文化财产保护这一概念对武装冲突中涉及的人员具有实际的含义。第三，文章讨论了军队与人道主义部门应重视文化财产保护的原因，以及遗产部门为吸引这些看似不可能的合作伙伴的兴趣需要采取的行动。第四，文章列举了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面临的部分主要威胁。最后，作者对未来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保护的作用做出了预测。

32. 突如其来的和平：“战后”的问题与期许 — 休伊·伊金 (Hugh Eakin)

近年来，在武装冲突中保护文化纪念碑已成为国际上的当务之急。但受到威胁的遗址是否能够长久幸存下来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突停止后的状况。

摘要: 在过去的 25 年里，围绕人类冲突与遗产损毁的多数讨论无不以战争与恐怖主义这两个密不可分的问题为主。全球人民对遗址与纪念碑遭到的蓄意袭击的愤怒促使西方各国与国际组织采取全新的重要手段应对交战团体与军队发起的袭击。但如果以保护为目的，那么历史告诉我们此举局限重重。在“激战”的背景下，我们很可能无法在损毁行径结束前组织有效的应对措施。同时，摧毁行径往往发生在“和平”时期，这时主权政府当政，且国际行动者们不愿进行干涉。事实上，遗址是否能够长久幸存几乎始终取决于当地社群及政府采取何种措施。本文以这些见解为基础，直击冲突后环境下的灰色地带，只有当国际势力、组织、资金与全新的统治秩序全部到位时，我们才能在袭击发生前抢先采取直接措施。从科索沃与叙利亚到塞浦路斯和阿塞拜疆的例证我们看到，在近代，威胁加剧，同时机会增多，国际势力的参与有助于将暂时的保护转为长期的传承。

结语：用于研究、制定政策与行动纲领 — 詹姆斯·库诺 (James Cuno) 与托马斯·G·怀斯 (Thomas G. Weiss)

Contributors

索引